



傅椿在高邮

□ 翟荣明

汪曾祺先生有诗云：“家近傅公桥，未闻有北海。”邗人皆知，傅公桥乃因清代知州傅椿在邗城东北建桥而名。近300年来，该桥虽屡有迁移废兴，但傅公桥之名却始终珍藏于里巷口碑之中。然而，若论傅椿在邗功绩，则远非一座桥梁所能概言。

傅椿，字受先，一字乔年，号毅斋，奉天襄平人，隶满洲镶黄旗，一生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九年(1731)秋，由汉军八旗国子监生莅任高邮知州；乾隆五年(1740)十月，升任直隶太仓知州；七年十一月，擢升淮安知府；十年七月，转任苏州知府，十二年离任；后历任职方清吏司候补郎中、兵部郎中等职。傅椿在邗期间，曾因回乡守制，由灵丘人支本固代理知州三个月，前后在邗为州守长达十年。其在邗举措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砥砺风俗，修坛筑祠

傅椿十分重视礼制教化。先农坛本为祭祀神农炎帝而设，雍正十年，他主持修建位于邗城西南隅的先农坛，用砖墙代替土墙，在坛周开挖环形水池，中间建小桥以连通，使坛制趋于完备。社稷坛是为祭祀土地、五谷之神而设，州治西北隅旧有社稷坛，前明嘉靖时期曾经重修，久已荒废。乾隆二年，他捐俸倡率，重修该坛，使坛高二尺一寸、广二丈五尺，并砌以周长达一百二十丈的围墙。已荒废

100多年的社稷坛得以重焕庄严。

傅椿曾旌表有孝义之行的国学生徐权，称其“励行式俗”；还曾嘉奖苦节扶孤、孝事孀姑的袁王氏，赞其“节孝维风”。节孝祠是祭祀已受朝廷旌表的节妇、烈女、孝女之所。高邮节孝祠旧在南门外，岁久倾颓。乾隆三年，他在北大街中市桥附近择地新建节孝祠。使得邗邑节孝昭彰，民风淳朴。

(二) 兴利除弊，浚河筑堤

雍正十二年，傅椿撰写《筹淮八议》，论及山阳县城北乌沙河、城南泾河，高邮、宝应间子婴沟等入海水道的利害，剖析精准，举措恰当，可见其经世之才。

高邮常有水患，傅椿与扬河通判李宏共商水利。乾隆二年，他组织挑浚城外三面濠河、城内市河、南北濯衣河、广储仓河、城北三处市河、运盐河等河流10余处。见南门琵琶闸下之水东行后无所管束，水大之年，靠近城郭之田常一片汪洋，他组织民夫在东门外用疏浚城壕之土筑成数里长堤，沿堤栽种柳树百余株。堤成之后，不仅城东低洼常被淹没的农田皆获丰收，而且一改往昔商队、驿马须穿城而过、常惊扰居民的现象。次年三月，百姓在堤的南首立“傅公堤”石碣一块。道光二十二年(1842)，该石碣在城濠内被发现。邑人王敬之慨然作诗二首，其一云：

老树随樵斧，今无东郭春。百年留孔道，十里便行人。

贤宰流风在，荒波片石论。擘窠隽字出，拭看尚如新。

(三) 便利交通，建桥设渡

乾隆二年，傅椿在傅公堤北首建桥一座，便于百姓通行，人称“傅公桥”。桥东南建欢喜庵，冬夏季节施放姜茶，使往来商旅有了休憩之所，后称永祥庵。五年，他在北门外康泽侯行祠南侧设渡口，人称“傅公渡”。此渡一开，方便了运河两岸的交通。北水关之北，原有马家渡，他在此改建桥一座，以代舟楫之劳，人称“接渡桥”。从此，城东、城北、城西水陆连通，商旅无阻。

(四) 赈灾济民，兴建两堂

雍正十三年，傅椿奉旨修建高邮普济堂、育婴堂，并捐廉倡始。又动员乡绅贾兆凤、夏之芳等，共募银二千二百余两，购买被朝廷查处的原江苏巡抚吴存礼位于南门中市桥大街的房产为基址，兴工修建，耗时十月，于乾隆元年元月竣工。南为普济堂，建有药王殿、配药房、廨房等数十间；北为育婴堂，设有客厅、观音殿、乳妇房等五十间。又筹画日常运转经费，将原属两堂及新置数十间房屋、数百亩田产归两堂使用，推举十二名贡监生员分管其事。他还撰《建普济堂、育婴堂碑记》，订立

堂规十五条，摹刻勒石。使善举有制可循，可谓部署得宜。

常平仓丰年余入，荒年巢出，以平抑粮价，备荒救灾。乾隆元年，傅椿组织添建了大、有、元、亨四号仓廩共十二间，扩大常平仓的存储量。同年秋，高邮水灾歉收，他支常平仓米，抚恤饥民一个月，又奏请朝廷续赈五个月。次年，他又奏请免除后四伍、后五伍、后七伍三地低洼田租银一百四十四两，以除民困。

(五) 改革创新，捐修学宫

乾隆二年，傅椿捐俸修葺学宫，在棖星门外泮池之南建屏墙一堵，栽松柏数百棵，使学宫的殿宇门阙焕然一新。他还创制考棚桌凳，以“元魁杏花春雨桂子秋风”十字编号。从此，参加考试的生童再无自带几案之劳，深感便利。

傅椿在太仓，案无留牍，洞见委曲，人以为公；升任淮安知府离开时，太仓百姓攀辕泣送，皆惜其去。可见其官品仁政，得民心之深矣。

傅椿在邗，重教化，建梁津；兴水利，恤孤贫。每有善举，常捐俸倡率。今天，傅公堤、傅公渡已不存，傅公桥亦非昔日之桥，而桥名仍在，足见百姓感恩缅怀之意。则傅公之名，当可以传永久矣。

文化馆学画记

□ 戚晓曙

“文革”期间，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高邮城里的中小学生学习歌舞、乐器、体育、美术的趋之若鹜，但只有进东方红小学小红花宣传队、体委少体校、文化馆美术培训班的才算正宗。我曾是美术培训班的一员，还记得一些人和事，记录下来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74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准备上初中，在父亲的逼迫下，开始学习画画，并拜吴万林老师为师。我有一个堂兄，比我大两岁、高一个年级。我告诉他我学画画了，问他愿不愿意一起学，他马上答应了，于是，堂兄弟变成吴万林老师门下的师兄弟。过完暑假，我去红旗中学上初一，又拜了学校教美术的高祥吉教师。我和堂兄经常去他那儿请教，他给我们讲素描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灰色，被我堂兄起了个“高级灰”的雅号。

1975年寒假，在高祥吉老师推荐下，我参加了文化馆的美术培训班，堂兄也插班进去学习。在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朱葵老师。他是一个极具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牵头办起中学生美术培训班。早期的培训班，学员来自县城和乡镇中学，临泽的孙树伟、横泾的殷锋都有过培训经历。到我参加培训时，学员仅限于县城的三所中学。还记得的学员有，高邮中学的厉明、崇敬东、孙东旭、陈立辉、连震、朱军、张晓萌、王晓等，红旗中学的有上高二的陆裕、肖杭，上高一的沈建钢，还有同班女生王培。

每次培训时间多在寒暑假，大概二十天左右，共三十多名学员，主要培养美术创作能力。学员边创作边学习，作品完成后，统一参加县中学生美术作品展。我首次参加的培训班，老师阵容十分强大，朱葵老师全程指导，戎经亚、朱瑞庭两位老师协助，并邀请了临泽中学的殷作安、曙光中学的翁瑞华两位老师辅导，还邀请了南益小学的马其老师辅导花鸟画。殷作安老师回去后，也办起了美术兴趣小组，成为美术人才培养的新基地。

厉明是培训班上最牛的学员，高邮中学高一学生，他曾是小红花宣传队的首席歌手。厉明上中学后，开始学习美术，再次风生水起，他创作的国画《最后两个小观众》，入选省青少年美术作品展，并刊登在《新华日报》上，在美术少年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遗憾的是，这位才子后来去了扬州木偶剧团，从那里离开后不知其去向。

在这次培训班上，我第一次尝试创作中国画。我选择了热门的上山下乡题材，一个老农和一个知青站在田埂上遥望远方。我先

从刘文西的《祖孙四代》中，摄取了儿子和孙子的站姿，又从《工农兵形象选》中，选出老农和知青的头像，很快就完成了国画稿，又请吴万林老师做了润色，我的第一幅作品《新农村》便大功告成。堂兄的选题来自真实体验。他家在粮食局内，后面就是刚开挖的新河，经常看到农民送粮入库的场面，于是他画了一幅《踊跃交售爱国粮》的水粉画。

1976年寒假的美术训练班，红旗中学新增了印海平、曹群飞等，高邮中学新增了周勇、颜彪、涂志成等。这次创作主要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我这次创作的仍然是中国画，画的是革命师生批斗学校走资派，堂兄创作了一幅《拒腐蚀永不沾》中国画。不知什么原因，这期培训班没有举办美术作品展。在这年的暑假班上，我的创作选题来自下乡支农的经历，画的是几个学生给忙收割的农民送水的场景，名字好像是《丰收田里送水忙》。在创作过程中，丰收的稻田总是表现不好，便参考了伍启中《心潮逐浪高》里的金黄色稻浪。

1977年寒假，文化馆承办了扬州地区美术作品展。朱葵老师从培训班学员的作品中，选中了我的《丰收田里送水忙》和陈立辉的一幅画参展。能参加地区成人级别画展，说明我们在学员中的创作水平还可以。地区美展设在城中小学内，学校腾出六间教室作为展厅，每间教室配了一个中学生看守，我被朱葵老师派去做第一展厅的保安。我隐约感到，朱葵老师对我有点栽培的意思，首先是把我的作品送去参展；又让我做展厅保安，观摩学习参展作品；更重要的是，展厅保安每天有八毛钱工资，十几块钱对中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在我值守的展厅中，观众对两幅作品赞不绝口。一幅是《我们胜利了》水粉画，占据了教室放黑板的位置，画出了工农兵对粉碎“四人帮”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庆祝，已达到了宣传画出版印刷标准。另一幅是泰州潘老先生的国画，一群鲜活如生的鲤鱼在水中游弋。据知情者透露，潘老先生画鱼不画水，以尾定势，先画鱼尾后画鱼头鱼身，堪称一绝，有些观众三番五次前来欣赏。

1977年暑假，是我最后一次参加美术培训班，龚定煜老师是水粉画辅导老师。他给我们讲授水粉画技法，还展示了他在大学期间的习作，学员们看后顶礼膜拜，纷纷改画水粉画，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创作了一幅《一场特殊的考试》，选题来自《新华日报》的一篇报

道，一个中学生在医院病床上坚持考试的故事。画好后，龚老师对局部做了些修改，画面顿时焕然一新，有画龙点睛之感。堂兄画的是一群民兵在芦苇荡中练兵，陈立辉画的是陈毅元帅打游击的情景，都是水粉画。

我的第一幅作品完成后，又创作一幅国画，选题来自粮食局大门楣上“来个比赛”标语。我画了一个工人站在压路机前，高举拳头向同伴发出挑战。压路机没见过，便用了周思聪《山区新路》中的压路机。培训班上，朱葵老师还介绍了水印木刻技法，但多数学员都跟龚老师画水粉画了，只剩下海平等几个响应。这次培训班结束后的画展，展品不仅有培训班的，还有临泽中学美术兴趣小组的。文教局的一个领导去看画展，特别赞扬了我的《一场特殊的考试》和一幅竹子工笔画。

转眼到了1977年10月，满大街都在传播恢复高考的消息。文化馆临时办了美术高考复习班，来的主要是上山下乡知青、各期的训练班学员，朱葵老师、戎经亚老师还有龚老师时不时过来指导。正式考试之前要进行初试，我和还在上高一的曹群飞也准备碰碰运气。走进初试考场，发现有近两百人。通过初试的有四五十人，大多是在文化馆备考的，我和曹群飞都通过了初试。

那年，只有南京师范学院和景德镇陶瓷学院招生，大家一窝蜂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曹群飞报了景德镇陶瓷学院。南京师范学院考了素描、速写和创作三个科目。创作命题是“艰苦奋斗”，我画了一名工人在工地扛木头，陈立辉画的是一个知识青年打草鞋。据说，曹群飞的彩色图案设计考得很好。考试结束后，主考老师要看考生的平时习作，排在我前面的是华龙宝——一个资格培训班学员，他送去的习作老师收下了，我送去的他们瞄了一眼就退还了。考试结果出来，只有华龙宝脱颖而出，其他人全部打了酱油。

1977年美术高考结束后，我又参加了普通高考的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我准备了两三个星期，结果语文、数学都顺利过了及格线。后来接到一个通知，在校生预考总分要在180分以上，我只好老老实实回到学校上课。高二班主任感觉我有些学习能力，认为考上美术学院希望渺茫，劝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我只好忍痛割爱，全力以赴准备1978年的普通高考。结果，那年全县的美术考生全部名落孙山。转成普通高考的学员

中，红旗中学的陆裕考到天津大学，肖杭考到南京医学院，我考到扬州师范学院，王培录取到交通部的中专学校。

如果1978年我不参加普通高考，应该有一次考美术大专的机会。那年高考结束后，国家搞了一次扩招，扬州师范学院委托高邮师范学校承办美术师专班，毕业后到高邮、宝应、兴化的乡镇中学任美术教师。面对送上门的机会，堂兄、陈立辉、崇敬东等优秀学员竟无动于衷，特别是陈立辉，其伯父陈占元就是师专班的美术老师。这也难怪，他们在县城都有了正式工作，不愿去乡镇做中学教师，没有参加扩招考试的动力。师专班招录的大多是上山下乡知青，还有殷作安老师的几个门生。

那些还上高中的学员，一看形势不对，几乎全部转向普通高考。1979年，美术考生又一次剃了光头，而参加普通高考的大多数都上了岸。其中，颜彪考上南京工学院，海平考上南京气象学院，还被公派到法国留学。1980、1981两年，殷作安老师有三个门生录取到省属美术中专，堂兄和陈立辉等少数学员依然屡败屡战。到1982年，堂兄终于铁树开花，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堂兄毕业后，辗转到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最终成了副院长，他就是高校设计教育界大名鼎鼎的戚跃春教授。

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同学王培在放弃美术二十年后，经过培训班熏陶过的那颗种子，在40岁时终于发了芽，她听从“艺术的召唤”，成了一名旅澳职业油画家。她的油画色彩丰润大胆、画面优雅唯美、意境神秘超凡，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艺术大展，被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商户和文化艺术组织收藏。王培特别喜欢画水乡随风摇曳的芦苇。2014年，她的三幅芦苇油画被印制为上海地铁纪念卡；2017年，她的《运河芦荻情》系列油画入选国际WCCO组织主办的“运河风情”美术作品展。

朱葵老师调回南京后，留在高邮美术界的学员所剩无几，日渐式微，但高邮美术文脉并没有因此而中断，来自临泽的丹青好手撑起了高邮美术的大梁。前有龚定煜老师、姜文定老师，后有房林老师承前启后，再有殷锋老师接棒美协主席，他们在时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建奇的筹划指导下，借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东风，与中国美协共办“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美展，把高邮美术事业推向了新高度。朱葵老师九泉之下有知，当无憾矣。